

· 客家研究 ·

行政区划变迁对客家文化发展的作用

——以福建三明地区为例*

邹春生

(赣南师范学院 客家研究中心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唐宋时期大量外来移民涌入福建三明地区,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族群结构,促进了经济开发,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三明地区在客家发展史起了重要作用,三明行政区的隶属关系频繁变动使得该地区的文化分区十分复杂,影响了三明地区的客家文化整合。

关键词:客家文化;行政区划;三明地区;族群结构

中图分类号: K901.6; C95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8332(2013)05-0011-04

引言

学者在探讨客家文化的形成原因时,通常十分关注移民运动的作用,认为正是由于历史上的移民运动,才使客家文化在赣闽粤毗邻区这块土地上逐渐形成。然而,移民运动对文化发展往往是起分裂的作用,因为移民运动必然带来异质的文化,移民运动的直接后果是使文化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移民运动给赣闽粤边区带来了许多异质的文化,这些文化经过长期的整合,最后才形成客家文化。关于赣闽粤毗邻区多元文化的整合机制,以往学者关注不多。

选取三明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它与龙岩地区进行比对。这两个地区在历史上都有过大规模的移民运动^①,但在后来的文化发展中,龙岩地区成为著名的客家文化区^②,而三明地区却没有形成完整的区域文化。试图从行政区划制度方面,分析两地文化发展存在迥异的原因,以期揭示多元文化的整合机制。

一、唐宋时期福建地区人口和姓氏的迁入概况

三明地处福建西北部,现下辖永安、大田、尤溪、沙县、将乐、泰宁、建宁、宁化、清流、明溪等10个县(市)和梅列、三元两区。唐宋时期,三明境内的行政区划比较复杂,曾经为建州、西镛州、南剑州、邵武军、临汀郡(汀州)等州级行政区划管辖,辖内也曾设置过将乐、邵武、沙县、绥城、建安、尤溪、黄连(即宁化)、沙县、归化(泰宁)、建宁、清流等县。

历史上中原地区汉人南迁的移民运动发生很早,但对客家形成有直接作用的乃是唐宋时期的大规模移民运动。^[1]正如相邻的龙岩地区那样,三明

地区在唐宋时期也接受大量的外来移民。

中原汉族人口向三明地区的移民,早在两晋时期就有一些中原汉人进入三明地区,在三明地区的宁化、将乐县一带的世居人口中,有些就是在这一时期从中原迁徙而来。唐至五代时期,随着中原汉族政权对南方地区的进一步推进,更多的中原人口进入闽北地区。如,唐总章二年(669年),河南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官兵眷属共8000多人(58个姓氏)入闽,征剿平定泉、潮间畚族的“啸乱”后,定居于闽,军民人口逐渐融合同化。大顺二年(891年),河南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带3万余名官兵、民吏(36个姓氏)入闽。这些入闽者就有部分定居在三明地区。^[2]卷三《人口》

两宋时期,随着南方经济的开发,北方汉人迁入福建的人口就更多了。朱熹在一篇跋文中称宋代北人入闽的情形“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3]卷八三,《跋吕仁甫诸公帖》。庄绰也说“建炎以后,西北流寓之人,遍满于江淮、湖广、浙、汀、闽。”^[4]上卷。泰宁邹氏、邵武李氏等均是在唐宋时期从北方中原地区迁至闽北的。^[5]卷30-37。明代黄仲昭在谈到宋代建州风俗时曾说“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难于此,故建州备五方之俗。”^[6]卷三《风俗》

中原姓氏进入三明境域的情况,在三明地区各县县志的“姓氏”篇中,有不少记载:

唐朝前期彭氏、杨氏、廖氏等姓氏进入闽北地区。如泰宁县的廖氏、杨氏也是在唐贞观年从中原一带迁入而来的。^[7]

* 收稿日期:2013-08-1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1YJC850038)

作者简介:邹春生(1971-),男,江西瑞金人,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① 关于龙岩地区的移民概况,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再赘述。敬请参看《福建移民史》(林国平著,方志出版社2005年)、《福建六大民系》(陈支平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福建客家》(谢重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② 关于龙岩地区客家文化的研究成果,可以参见《乡土中国:闽西客家》(谢重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和《闽西客家研究丛书》(四卷本)(张佑周主编,四川民族出版社2012年出版)。

在《宁化县志》里,也记载了不少唐宋以前迁入该县域的姓氏。晋代迁入宁化的姓氏有两个:邓姓于晋太熙元年从山西滔分迁入宁化石壁,邱姓于东晋从河南迁入宁化石壁村;唐代迁入宁化的姓氏有三个:刘姓于唐乾符年间从河南洛阳迁入,伊姓于唐乾符元年从开封陈留县迁入,官姓于唐末从山西解县迁入。^[8]卷三《人口》

《清流县志》也记载了唐宋以前中原南迁进入该县域的部分姓氏,如:

赖姓 世居河南颖川。东晋太和元年(366),因兵乱徙居活州丰宁杼原。唐僖宗乾符元年(874)赖标徙居汀州古路上杭县古田,至其孙始迁居清流赖安、赖武等地。

陈姓 唐陈雍从河南颖川陈县迁沙阳固发冲(今永安贡川)。之后,又迁归邑(今明溪)陈村。

魏姓 唐魏征之元孙魏慕,原籍山东清平县,为唐时显宦,因避乱而迁至江西豫章,至六世魏贞入闽,从居宁化。宋时再迁入清流。

此外,还有黄、王、叶、邹、裴、上官等姓氏,亦是在唐宋时期从中原地区直接或辗转迁入清流县域。^[9]卷三《姓氏》

唐宋时期外来人口的规模,应该是不小的。学者根据《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等对唐后期至五代时期北人南迁进入福建的姓氏人口进行统计,共得98人,分别分布在福州31人、泉州36人和建州31人,也即进入福建北部人口占了实例人口的三分之一强。^[10]由于这一时期移入福建的人口较多,福建人口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自唐开元至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各州户数增长中,西北部的建州人口增长最为迅速,增长比例高达837%。^[11]

两宋时期三明地域分属南剑州、邵武军、汀州等所管辖。这些州县所辖人口亦有较大幅度提高。汀州人口增长最快,因为其本身人口基数低,南宋初的人口数量若与宋初相比,其涨幅高达831%,是当时福建境内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地方。邵武军本身人口基数大,但若与宋初相比,其增长为344.8%。是宋代福建人口实际增长最多的州军。南剑州人口的增长亦达177%,实际增长了100419户。^[12]

二、移民运动对区域文化发展的影响

唐宋时期大量外来人口进入三明地区,对当地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 改变了原先的族群结构

据考古发现,福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活,著名的三明市万寿山文化遗址,就表明早在距今18万年以前,在闽北地区就生活着福建当地的土著居民。^[13]关于东南地区的早期居民,学者认为主要是越族,因为分布很广,所以在称谓上有扬越、骆越、闽越、瓯越之分,其实同属于古越族,统称“百越”。但也有学者认为在福建境内的“闽越”,应当分称“闽”和“越”,闽族是福建的土著闽族,“越”

是从浙江南下的外来种族。^[14]学术界对这些土著族群民族性质的界定存在分歧和争论,无法抹杀福建地域本身就存在土著居民的事实。当然,这些土著族群在秦汉以后随着中原汉族政权向南方地区推进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屠戮、强制外迁,所以原先作为一个单独的民族所体现出来的完整性也遭到重大破坏。尽管如此,他们在当地的人数和势力自然不可低估。然而,自唐宋以来,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必然使三明地区原先以土著人口为主的人口结构遭受到巨大的冲击。上述人口的高额增长比例,尽管其中也包含了土著人口的增长,但按照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这些增长显然只能是以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所导致的结果。这些大规模迁入的外来人口,势必改变该地原有的血缘、民族构成等人口结构。

(二) 促进了三明地区的经济发展

唐宋时期南迁而来的中原姓氏和人口对三明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社会进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诚如学者所云“宋元时期,北方人口入闽后,相当一部分落居于闽西、闽北地区,促使这一地区人口显著增长,进而促进闽西、闽北山区经济、社会的迅速开发。”^[15]著名经济史学者郑学檬先生在分析宋代福建山区经济开发的原因时,就把大量拥有先进生产技术的北方人口的迁入列为首位。^[16]

外来人口对三明区域社会的开发最重要的体现,莫过于大量梯田的修建。福建地属武夷山脉东麓,多数地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由于平原面积稀少,人们只好开垦山间梯田。宋人对福建境内开垦梯田的情形作了生动的描述“七闽地狭瘠而水源浅远,……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17]卷三“闽山多于田,人率危耕侧种,塍(田埂)级满山,宛若繆篆。”^[18]卷十一《版籍类二·物产》这是对于福建梯田开垦的全景式描写。具体到三明地区,亦有相关的文献记载。当时三明地区分属建州、邵武等州军,梯田开垦的状况“建州山谷延袤相属,田居其间,裁什三四。”^[19]卷二十一,《项卿守》邵武“地狭山多,民随山高下而田之。”^[20]将乐县“环邑皆山,层高而田,尺数寸垦,耰锄艰辛。”^[19]卷三十,《将邑丙戌劝农文》

(三) 推动了三明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唐宋时期,三明地区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以人才培养为例,考中进士的情况,唐代时三明地区出现了3名进士(建安2名,宁化1名),宋代则有207名进士(将乐县19名,沙县87名,尤溪县60名,泰宁县15名,建宁县26名)。^[21]第三章,《福建历代进士》此外,在整个宋代,三明地区还涌现了不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科技的精英,被朝廷授以不同的职务,《宋史》对此在人物传记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光是沙县籍的就有8位:张若谷、陈世卿、陈瑾、曹辅、邓肃、张致远、陈渊、张确。尤其是南宋时期出生于南剑州的杨时,一生精研理学,特别是他“倡道东南”,对闽中理学的兴起,建有筚路蓝缕之功,被

后人尊为“闽学鼻祖”。^[22]

唐宋时期三明地区文教事业的进步,应与当时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入有一定关系。当时迁入福建地区的中原人口,有不少是当时名士。学者曾专门收集了六朝时期流入福建的24位名士,并充分肯定了他们对福建文化的发展所起的贡献。^[23]另外,承前所述,三明地区地处山区,山多地少,由于移民运动,使得这里人口急剧增加,造成严重的人地矛盾。在人多地少的逼迫下,一部分人不得不从读书科举等方面找出路“居今之人,自农转而士,为道释、为伎艺者、所在有之。而惟闽为多,闽地偏,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①

三、行政区划对区域文化发展的影响

大多数学者都已认识到,移民运动对于赣闽粤边区客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在探讨客家民系的源流时,就花了巨大篇幅论述客家发展史上的五次人口大迁徙。^[24]谢重光在论述“客家形成初期的中心地域在闽西”这一论题时,也曾花了很大精力介绍唐宋时期中原汉民迁入闽西的情况。^{[25]85-129}笔者在上文也再次具体论述了移民运动对区域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虽然三明地区与闽西地区一样,在唐宋时期接纳大量的外来移民,但后来两地在文化发展方面却相距甚大。龙岩地区成为今天著名的客家文化区,而三明地区却无法把多元的文化整合起来,发展成完整的均质文化区。造成相邻两个地区在文化发展方面出现巨大差异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笔者认为历史上龙岩和三明地区在行政区划设置上的不同是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文化区(Culture Region)是指某种文化特征在空间上的分布。例如,根据调查或收集的资料绘图,以表示某种语言、宗教、艺术或其他文化特征在地理上的分布范围,就可以成为某种文化特征的分布区。^[26]行政区划的设置对文化区的形成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周振鹤先生在论述方言文化区形成的时候,就对行政区划所发挥的作用作了专门的论述:“长期稳定的行政区划,必然使同一区划中的语言、风俗等文化因素趋于一体化。一般而言,政区的地域范围越大,一致性越弱;范围越小,则越强。……而对于像唐、宋的州,明清的府这样的二级政区,所辖地域适中,对文化因素的趋同性而言是最有利的。州(府)治不但是一州的政治中心,而且一般也是该州的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因此,州(府)属各县与

州(府)治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之间的密切接触,也必然有助于消除各县方言的特殊之处,是各县方言自觉地向州(府)治靠拢。”^[27]张晓虹在论述陕西文化区的形成时也对政区的作用予以高度肯定:“政区形成以后,往往会反过来对区内的文化现象进行整合,在区域内形成同质文化。这是因为在同一政区内,文化接触频繁,联系密切。因此在长期稳定的政区内,极易形成均质的文化区。”^[28]

历史上龙岩和三明两地的行政区划的建置情况在唐代:三明境域已设有4县,分属3个州府;宋代三明境域增至7县,分属4个州府;清朝三明境域增至11个县,隶属5个州府。^[2]而龙岩境内自唐朝直至明清,其境域所设县级行政区划几乎都仅隶属于两个州府。^[29]由此可见,三明地区在历史上其行政区划的归属关系远远比龙岩复杂得多,而且变动十分频繁。

更为重要的是,汀州府这个二级行政区的设立对于龙岩地区客家文化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汀州行政区的最早设立时间在唐朝,当时辖有三个县:“唐开元二十四年,开福、抚二州山峒,置汀州。领县三:长汀、黄连、龙岩。”^{[30]卷二《建置》}对照谭其骧先生所编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汀州所辖三县的区域,囊括了现今龙岩市所辖的新罗区、长汀、连城、上杭、武平、永定、漳平等7个县级行政区和三明地区的宁化、清流、明溪、永安等4个县。^[31]汀州的名称在后来多有变化,其管辖的属县,也有一些变化,但不管怎样变化,后来各个历史时期在这里所设置的二级行政区的管辖范围几乎都与唐朝汀州完全一致。汀州府这个二级行政区长期稳定的存在,对于境内文化的均质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后来这里出现的客家文化,应该与汀州府这个行政区的长期稳定存在密切相关,历史上汀州府(路)所辖区域,恰恰也就是今天人们通常所说的闽西客家文化区,两者在空间上的高度一致,应该很能说明这一点。

20世纪60年代初,福建的行政区划发生重大变化,汀州府所辖10个县级行政区,6个转属龙岩地区,3个转属三明地区。由于汀州府的主体,尤其是府治所在地长汀隶属于龙岩地区,因此在提到闽西的客家文化区时,常常就以龙岩地区相提并论。而与龙岩地区紧邻的三明地区,由于在这里设立专门的二级行政区的时间非常短,至今才短短50余年,其辖区内的各县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分属于其他二级政区,所以很难形成均质文化区,境内分成了多块文化区。^②虽然现在所辖的宁化、清流、明溪3县被称

① 宋·曾丰《缘督集·送缪帐干解任诣改秩序》,四库全书本。

② 三明境内文化不同质的现象,从方言文化就可看出。根据学者的研究,三明境域可以分成六块方言区:“闽客方言区”(宁化、清流)、“闽赣方言区”(建宁、泰宁)、“闽方言与客赣方言过渡区”(将乐、明溪)、“闽方言过渡区”(大田中部、尤溪大部分)、“闽中方言区”(以三明市区为中心)、“闽南方言区”(大田西南部)。相对而言,龙岩地区的方言分布就简单得多,仅分为三块:“闽客方言区”(龙岩地区大部分)、“闽南方言区”(仅龙岩市区、漳平)和“中山镇方言岛(军家话)”(仅武平县中山镇)。参见:李如龙《福建方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83-84页。

为是客家县，^[25]⁹⁴宁化石壁村还被称为客家祖地，并定期举办祭祀客家先祖的仪式，^[32]但作为一个整体，三明地区给人的客家印象还是非常模糊，依然还没有像龙岩地区那样，被人们当作是一个完整的客家文化区。

结语

移民运动对于一个地区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上述三明地区发生在唐宋时期的移民运动对该地区族群结构、经济开发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移民运动往往是使区域文化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要把不同文化整合起来，还需要其他的力量。其中，设置合理且长期、稳定存在的行政区划，对于区域文化的整合有着重要作用。龙岩地区和三明地区不同文化发展结果就极好说明了行政区划对区域文化发展的影响。与龙岩地区相比，三明地区虽然也接纳了大量的外来移民，并且境内宁化、清流和明溪三县也被认为是客家县，但三明整个地区却并没有当作是客家文化区。究其原因，一是历史上的移民运动使这里的文化趋于多元化，二是历史上行政区的设置复杂多变，使这里缺乏一个文化整合的良好机制。三明地区的文化发展模式，对于我们认识赣闽粤毗邻区客家文化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比照意义。

参考文献：

- [1] 谢重光. 客家源流新探[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5.
- [2] 福建省三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三明市志[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2.
- [3] (宋)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6.
- [4] (宋)庄绰. 鸡肋篇[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5] (宋)杨时. 龟山集[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6] (明)黄仲昭. 八闽通志[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 [7] 肖名俊. 泰宁主要姓氏入籍小考[J]. 泰宁县文史资料, 1990, (7).
- [8] 宁化县志编纂委员会. 宁化县志[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 [9] 清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清流县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10] 吴松弟. 中国移民史(第3卷·隋唐五代时代)[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300-310.
- [11] 吴松弟. 宋代东南沿海丘陵的经济开发[M]//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 历史地理(第七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12] 徐晓望. 福建通史(第三卷·宋元)[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196-199.
- [13] 福建省博物馆, 三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三明市博物馆. 三明万寿岩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J]. 福建文博, 2002(2).
- [14] 徐晓望. 福建通史(第一卷·远古至六朝)[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58-61.
- [15] 林国平. 福建移民史[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5: 6.
- [16] 郑学檬.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6: 265-266.
- [17] (宋)方勺. 泊宅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8] (宋)梁克家. 三山志[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3.
- [19] (宋)方大琮. 铁庵集[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20] (清)张景祈. 邵武府志[M]. 上海: 上海书店, 2000: 162.
- [21]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福建省志·人物志(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22] 黎昕. 杨时略论[J]. 东南学术, 1990(3).
- [23] 林拓. 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24-30.
- [24] 罗香林. 客家研究导论[M]. 台北: 南天书局有限公司, 1992: 37-92.
- [25] 谢重光. 客家文化述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 [26] 王恩涌. 文化地理学[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 42.
- [27] 周振鹤. 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42-43.
- [28] 张晓虹. 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366-377.
- [29] 龙岩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龙岩地区志[Z].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30] (清)曾日瑛修, 李绂纂. 汀州府志[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4.
- [31]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 55-56.
- [32] 刘善群. 客家与宁化石壁[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钟俊昆

Function of Administrative Area on the Development of Hakka Culture ——Taking Sanming Region in Fujian as an Example

ZOU Chunsheng

(Hakka Research Center,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341000, China)

Abstract: Immigrant campaigns occurring in Sanming region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have changed the structure of local ethnic group, accelerated economic exploitation, and promoted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Samming region in Fujian. Sanming region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Hakka development. However, because of administrative area in the region frequently changing, Sanming region has not become an integrated region of Hakka culture.

Key words: Hakka culture; administrative area; Sanming region; structure of the ethnic group